

内部资料·欢迎交流

城市研究 简讯

Urban Study Newsletter

第8期（总8期）

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

大阪市立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事务所

2003年12月12日

“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

学术报告会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学术报告会于12月3日在华东师大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日学者以及博士生近四十人，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高瑞泉教授、大阪市立大学山口久和教授主持，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本次会议是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文部科技省 COE 项目“都市文化研究”和华东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的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报告会上，中日两国各有四位学者发表了论文，并和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下面是八位学者的报告摘要。

—以下按发言顺序—

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

——探求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摘要）

大阪市立大学 山口 久和

本文从中国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像，城市和知识分子，近世末期的“学”的观念的变化，清代考据学的知等四个方面全面展现了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并着重以被称为“国朝六儒”之一的阎若璩绍兴师爷章学诚为例加以阐明。

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是由传统上被称为“士”或“士大夫”，近世被称为“读书人”的知识分子阶层创造承担着的。中国的士彻底保持了其俗世性。到了宋代，出现了科举进身和新官僚阶层，代替了根据门阀地位和“族望”等世袭神性以保证身分的古代中世的旧式官僚，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走上仕途，其教养有“经世济民”等“致用”的一面，即俗世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妨碍了以知识追求为自身目的的近代性“学术”的成立。而对个别知识自身的追求作为学术而自立起来，个性表现得到社会的普遍认识，必须等待着近世末期乾嘉知识分子——其典型代表为章学诚和袁枚——的出现。

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将乡村描绘成世外桃源，另一方面时常批判城市生活使人性丧失。像这样一致痛骂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罪恶，成了近世知识分子的知的风潮。但是在现实中，他们并不拒绝城市。城市的基础设施，知识环境及知识分子的网络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然而时常挂在知识分子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可见，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城市价值观取代了连接乡村事物的诸价值观，开始被子人们所认知。但是由于前近代的中国社会依然裹着儒教的外衣，城市价值观和乡村价值观丝毫没有两样。然而知的近代化是从城市开始，并由城市知识分子不断推进的。

近世末期的“学”的观念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学”在传统含意上不是关于外界事体的知识，而是更多地和人类智慧有关的行为，经书的经义和训诂考证的文献知识只有关系到伦理道德才能保证它的价值，单是客观性是绝对无法保证知识的价值的。而在南宋嘉定年间，由于朱门末学偏向道问学，使尊德性和道问学，即智慧和知识开始发生乖离。之后，经过宋元三代，学问，加上新添的词章之学，被子分为训诂之学，儒者之学三类型，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进入清代之后学问从政治，道德那里获得了独立，知识再也不要通过现实参照始能判定其真理性，知识作为使用价值已经不再通用，它成了带有交换价值的东西。

在近世中国，知识分子几乎皆是家产官僚的后备军，他们将自身的教养发挥在名为“经世济民”的极其功利主义的方面，无意将教养的主要内容的经谈和史学作为客观的“学”来追求。在政治世界中实现儒教正义，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和人生理想，是作为教条的儒教信念，可是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被无情地阻挡了。清代随着时代的

后移，在不断增加的执意于脱政治的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诞生了像章学诚这样只对知识的理想状态感兴趣的近代意义上“学者”。

在清代考据学的知这部分里本文主要以举阎若璩和章学成为例，来说明知识分子从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蜕变这一现象。从阎若璩身上可以看出乾嘉考据学者对知的态度，即近代性学术知的原初状态，也即是并不考虑什么有用性而惟以知识为自身目的来追求，同时也表现了其脱离意识形态性。阎氏在被封闭的知识的圆环中享受着“为考证而考证”的文字游戏的乐趣。如今神圣的经书典籍已被解构，各种学术被沦落为单纯的被考究对象。另一位最能显示近代“学者”面目的要数章学诚了，他是被拒绝于政治殿堂的人，是脱政治的知识分子，作为补偿，他转向了对知识探求的关心。他不是将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为尊德性的伦理学史，而是将其作为道问学的学术史来把握，他不是从人类智慧的方面，而是倾向于从事体知识方面来把握知的。而阎章二人也只是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蜕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中的一例。

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摘要）

华东师范大学 高瑞泉

在近代这一价值观念变革中，知识分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世纪下半叶，随着价值观念变革过程的展开，形成了两个知识分子推动的社会文化运动高峰：戊戌和五四。从推进价值观念变革的角度看，晚清时期参与这场运动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对传统作自我批判的传统士大夫，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二是与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新兴阶层——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念；三是大量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留学生和其他有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四是随着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由新型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现代价值的信仰者。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少数知识精英转而对价值观念变革作更为形而上的思考，使之具备现代学术的形态。

鸦片战争前后的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龚自珍、魏源、俞理初等。他们是典型的传统士大夫而不是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只是内部的，主观上只是修正主义的立场。但是，他们通过考经论史、对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诠释，表达了一系列不同于正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在“天人之辩”领域，龚、魏对“天命论”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主张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与圣人对立的“众人”，决定“众人”活动与存在的是人的主观精神或自我意识。在“群己之辩”领域，他们强调“自我”，主张个性解放、人格平等，展现为理想人格，不是正統的圣贤，而是“英雄”、“豪杰”。

在“义利之辩”领域，他们尽管没有最终突破正统的价值观，但开始重视个人道德的物资基础，有了“欲的肯定和私的主张”，表达了对利益原则的追求。

洋务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与龚自珍类似的传统士大夫，如冯桂芬；二是与“洋务”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如薛福成、马建忠、郭嵩焘等；三是与洋务有关的新型商人，如郑观应；四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如王韬、李善兰等；五是受西式教育，长期生活于香港的“自由职业者”，如何启、胡礼垣等。他们信奉“经世致用”，主要从事实际事务。在价值观变革方面，其贡献主要集中在“义利之辩”。19世纪20到8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经历了一场资本主义的商业革命，“利”从“义”的限制中突出出来，其关系由对立转变为互补。

戊戌时期的知识分子 康有为、梁启超、谭词同、章太炎等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旗帜。价值观念的变革，无论是“天人之辩”、“群己之辩”，还是“义利之辩”，都因为他们而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天人之辨”方面，“天人”关系实质是人力与自然的对抗，是人对盲目的自然力的征服。在“群己之辩”领域，突破了古代主要局限于“人我关系”的视域。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都空前高涨，对个人解放、人格独立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五四启蒙思想家希望建立的个人本位价值的源头。在“义利之辩”方面，功利主义成为知识精英的主流意识，利益原则被视为道德的基础。

时代变革与知识分子的转型 由于西学的传播，戊戌前后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已经大大不同于龚自珍时代的士大夫，翻译西学在19世纪晚期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从事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晚清教育改革使知识分子不再完全在传统的王权体制中讨生活，成为现代价值的信仰者。清政府制度安排上的失措导致了普遍的道德沦丧，日益加剧了社会中的价值迷失。从洋务运动开始的现代化给离开传统体制另谋生计和发展的士人以多种新的空间，促成了新的义利观的建构和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

总之，近代价值观念的变化，从思想资源的动力来说，吸取了西方思想的资源以寻求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方案；从价值载体或物化承担的角度看，凭着现代技术和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制度安排方面的强势，新兴的知识阶层产生了，传统士大夫组成的文人集团则分化、衰落，最后消亡了。现代性价值的雏形也就诞生了。

商业化.城市化.儒教化的潮流和家的上升

——以南海县深村堡的霍氏为例子（摘要）

大阪市立大学 井上 彻

15 世纪以后珠江三角洲开始进行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伴随这一潮流，儒教化的现象出现了。本文使用的是儒教化是指广东社会被编入科举官僚制度之中，宗教等儒教文化渗透入地域社会这样的整个过程。

本文所关注的是儒教化的潮流之中抬头的霍韬，着重探讨霍氏经济活动的情况，通过霍韬对于追求私益的看法进行考察探讨在商业化，城市化，儒教化的潮流之中抬头的乡绅拥有什么问题。正德 7 年（1512），霍韬得了广州府生员，明年中乡试，正德 9 年，被选为会试第一名。霍韬的官僚经历从正德 16 年（1521）被任兵部职方司的那地点开始，经过詹事府少詹事，吏部左侍郎，然后作为南京吏部尚书到南京，嘉靖 18 年（1539）回到北京，就任礼部尚书，第二年病逝。

霍韬进入官界的嘉靖年间正是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和发展时期，这与霍氏进行增殖财富有密切的关系。霍氏以占有沙田的方法集积土地，并且很有可能用不正当价格买了土地。霍氏这种乡绅家族不单占有商场的管理权，对商品加私税，进行市场垄断。当时广东社会对占有市场，征收私税买卖商品等乡绅的活动的批判日增。霍韬也考虑到广东的舆论，不让家人抽私税，进行商品买卖。除了集积土地，占有市场以外，霍氏还插手开发矿山，秘密出售盐等各种活动。霍韬考取进士后，霍氏急速地增殖财富，他担心家人追求私益而引起各种纠纷，使家到灭亡。特别是霍韬注意伴随追求私益的纠纷为官界的敌对势力所利用。

正德 16（1521）年，霍韬被任命兵部职方司主事，在此前后被卷入大礼之议。嘉靖 1（1533）年，发生了广东按察司佥事龚大稔弹劾方献夫和霍韬的案件。龚大稔首先指出两人共通的罪恶。他们各自委托亲戚，占夺盐的利益，笼络市场交易的商品霸占重要码头，为了自己的利益捣毁官府的衙门或者强迫移居，抢夺寺庙和寺产。同时，龚大稔指出了霍韬的个别罪恶，诸如接受高要县民投献的时候，与民争沙塘，引起人命案件等于。大礼之议以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霍氏的追求私益的活动出现了被夏言一派利用的危险性。霍韬规戒家族追求私益的目的在于避免自家面临灭亡的危险。霍韬自己掌握儒学的教育，是能洞察政治形势的士大夫，但是他的家族不知伴随追求私益的危险性，不想抑制自己的活动。霍韬打算考取科举后，设立社学和书院，创立大宗祠，开始大家族生活等，他企图对家人施以教化，教育，培养适合士大夫的血统的人格，更加向官界输送人材，对他而言，教化和教育只是抑制追求私益的活动，是和乡里共存的最好的方法，同时因此也能让家族繁荣。

“轻性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表义实践

——以张爱玲为中心的讨论（摘要）

华东师范大学 倪文尖

“知识分子”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知识分子就是受过一定教育、有些知识的人；而狭义的，则至少再附加二条件：一，依靠知识为生存方式谋生；二，以知识为力量来自觉发挥其社会作用，或起码因知识和理性而能对自我及周边事况有所反思。知识分子必须有充分的“代表”意识，自觉地倚重知识，以知识的方式发挥社会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只能是“重”的一种类型，并且，知识分子之于现代中国的贡献，也只有那一种非常“重”大的方式：介入性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

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提出了“轻性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她看来，“轻性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特征：有“清平的机智见识”、“有点像周作人他们”、其身份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甚至还“不喜欢文人”，要与知识分子“撇清”。但是，特别不喜欢周作人那样旧式、传统的“文人气”。她所谓“轻性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是“都市上海”、“职业人士”、“现代社会”、“清平机智”。

张爱玲提出“轻性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有对那种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观挑战的意味：知识分子当然是“重”的，但是，知识分子也可能是举“重”若“轻”、甚至本身就是偏“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现代”的表义实践中，价值不可估量。知识分子不仅是中国现代的重要实践主体，而且更是“现代”的意义来源。然而，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的方式仍然可能是多样的，在我们所熟悉的那种“重”的方式以外，像张爱玲所代表的“轻”的方式，也深入地参与到了中国现代的表义实践。

20世纪，充满中国大地的是政党政治与斗争及五四的意识形态、法俄传统等“正册”的现代性理论与实践。张爱玲等追求“安稳”的“另册”现代性道路虽然与“五四—左翼”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也决非“怀旧”甚或反“现代性”，但是在张看来，与其要“五四—左翼”、政党政治（国共）的民族主义的那一套，还不如要越了民族主义界的“我们的文明”，“我们的那套现代性”——“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中国百年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一道路绝不可行。而且张及其背后的文化内部也是问题重重。她要的只是一般的物资生活，不要“奢侈享受”，她把“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当作工具理性、实用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但在更多的场合，她又基本不取这种思维方式。她从不把个人、人性应该承担的责任推至社会、历史之类的外部因素，而是视之为人性自身的普遍缺陷。这就导致了一方面张的理念呈现出一个大漏洞；另一方面张及其背后的文化对这大漏洞无可奈何。“轻性知识分子”在职业化的写作中，以其所创造的文本世界，表征了中国的“现代”的

某些非常重要的侧面，甚至还蕴含了中国如何“现代”的思考与批判；同时更以他们的身体力行、所作所为，具体而深刻地进行着中国现代的表义与实践。

与此同时，“轻性知识分子”的现代想像与实践，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那种属于“正册”的中国现代性一样，都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产物，也都受制于“1840”以来的严峻的历史语境，如果说“正册”的现代性已经陷入了危机的话，那么，张爱玲们的“另册现代性”也是充满了危机的，这甚至是由他们的亲身实践与遭遇所表征的。

《每日电影》时期的姚苏凤（摘要）

大阪市立大学 白石（张）新民

《每日电影》创刊于1932年7月8日，主编姚苏凤。目前中国电影史和电影批评史关于《每日电影》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原因一直没有澄清。对姚苏凤更是鲜有提及，而关于《每日电影》以及姚苏凤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3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决不是毫无意义的。为此，本文着重对姚苏凤在《每日电影》的创刊及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与左翼人士之间关系以及《每日电影》转变原因进行考察分析。

《每日电影》主要是致力于开展电影批评、有声电影的提倡和中外电影动向介绍三大方面。关于国产电影的发展，《每日电影》指出，投机取巧阻碍了国产电影的发展，唯有“纯艺术”发展才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正途。《每日电影》创刊不久便展开了抨击美国注册影片公司设立和对影片《人道》的批判的活动。1932年7月姚苏凤在《每日电影》上发表了“西方商人大举来侵国产电影公司阵地不稳固——谨以安内攘外，长期抗战之义进一忠告”。7月21日，洪深发表了“美国人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办影片公司摄制中国片”一文，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角度，对两家美国注册公司进行抨击。此后，《每日电影》又陆续发表了10多篇抨击美国注册公司的文章。在现有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对《每日电影》发挥的中心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姚苏凤和国民社会局所发挥的作用只字不提，这是不应该的。

《每日电影》自创刊到1933年6月18日“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发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发表了530多篇影评，对60多部电影和360多部外国电影进行了批评。就“陈述”的具体内容而言，首先强调了《每日电影》的严肃办刊态度。与创刊初期相比，“陈述”有以下几个变化：第一，电影批评的基本方针由对不良影片的制裁转变为建设性的批判。第二，电影批评由创刊初期对电影的督促作用和对观众引导作用集中到对电影制作的指引作用上。第三，电影批评方式上强调了对“值得注意的影片”批评的统一性。在这一过程中，姚苏凤意识到仅从严厉的一面来强调公正性

对电影批判，往往会被人误解，引起对方的反感，还应加强电影批判的指导性作用。

“苏凤凌鹤间的笔战”肇端于凌鹤对姚苏凤《路柳墙花》的批判。笔战结束不久，围绕苏联电影《循环》的评价问题，姚苏凤又重新向凌鹤开火。与此同时，姚苏凤以“苏联的影片不一定是好的，犹之美国的影片不一定是坏的”对《循环》进行否定。

从当时左翼人士在电影副刊的活动情况来看，许多迹象表明“苏凤凌鹤间的笔战”之后左翼人士脱离《每日电影》转入《影谭》是左翼人士进行的一次战略性阵地转移。为加强《影谭》在电影舆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影谭》创刊不久，尘无就以离奇的笔名在《影谭》上发表了“上海电影刊物的检讨”，开始贬低《每日电影》。“苏凤凌鹤间的笔战”使《每日电影》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困境。《青春线》公映之后，通过影评人对《青春线》的态度，才使姚苏凤恍然大悟。在一种孤立无援处境之中，姚苏凤开始进行重新选择。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地基础问题”一文拓破了《每日电影》自《青春线》之后两个多月的沉寂，开始向《影谭》发起进攻。以此为标志，《每日电影》开始倒向“软性电影”论者一方，成为“软性电影”论者进攻左翼的主要阵地。

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

——以上海为例（摘要）

华东师范大学 许纪霖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既是一个经验的理想类型（idea type），又是一个诉诸于现实批判的乌托邦解放模式。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公共领域只是欧洲的一个特殊经验，它是否有可能成为跨文化的普遍模式而适用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本文拟从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历史演变研究入手，以上海为例，分析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共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公共领域的理论可以“跨文化”而无法“超文化”，当我们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时候，概念的有效性必须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并且通过跨文化的历史比较，看看同一个公共领域的事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特殊性面貌的。

在古代中国，“天”为社会提供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泉。儒家的民本主义虽然拥有公众舆论作为权力合法性的内涵，但由于没有人民主权理念的配合，依然保留着“天意”的终极价值，所以始终无法开拓出现代的民主观念和公共领域的现代体制。

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

题，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

宋明以后江南士大夫注重创办书院，形成舆论，对清末上海的改革路向起到了潜移默化作用。近代以来，西方人带来的新型事业、洋务运动所形成的商业氛围，为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环境，使得上海在建构公共领域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公共领域的中心。

在上海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中，郑观应和梁启超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郑观应非常重视办日报和学校。梁启超在上海主笔《时务报》期间不仅提出了一套中国式的公共领域观念，还提供了在中国建立公众舆论的成功实践。自《时务报》以后，上海成为了全国舆论和公共领域的中心，并从此不可动摇。

近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其基本结构的最初形态主要是学校、报纸、和学会以及作为补充的集会、通电等，其中报纸和学会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民国成立以后，学会被专业化或党派化了，失去了公共的性质；学校也逐渐学科化、专业化，在整体上与政治脱钩；报纸和杂志担负起扮演公共领域的角色。由于党派化的日益严重，许多报刊杂志也失去了公众舆论本来应有的公正、客观和公共性质，以至于淹没了公正、客观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公共领域也有一个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他们新的空间形式里，摆脱了传统的等级性关系，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交往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公众意见自由讨论的空间，应该排斥党派化。非党派化的公众舆论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公众舆论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不是个人意志或私利的简单总和，而是每一个公众超越各自的利益所限。批判性是公众舆论的核心。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主体——士大夫或知识分子，在从事公众舆论时突破了民本主义传统，将舆论的功能与现代民权概念联系起来，具有鲜明的批判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解读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现象。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最基本的普世特征，首先是由独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众在此空间之中从事公共批判，形成公众舆论。其次，中国的公共领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拥有深厚的本土资源。再次，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在发生形态上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等政治主题紧密相关，无法在社会内部获得其稳定的体制化和合法性。最后，由于近代以来上海拥有一系列的特殊条件，使得上海成为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中心。近代上海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衰史。

横光利一《上海》中的空间表现（摘要）

大阪市立大学 广重友子

本文从地理学中的风景论视角对横光利一的代表作《上海》的记述进行了整理，指出了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上海”的形象也在变化以及《上海》内在的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的关联性。另外还指出了使用地理性和历史性的资料探讨它们和作品世界之间的接点时容易产生的问题，并尝试了在阐明作品内部构成的基础之上，与资料进行对比的方法。本文作文本分析所利用的基轴是前田爱“SHANGHAI 1925”。

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问题的提出：关于分析“上海”与“事件”。本文将用不同的方法重新接近前田原先提出的问题，即横光是如何把排除了具体“地名”及“日期”的《上海》建构起来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指明《上海》的内部结构，并探讨横光建构《上海》的意图。为此，本文将从仔细整理《上海》的记述开始。通过这一作业，去发现横光用以建构《上海》的手法以及阐明作品的内部构成。

第二章，《上海》中发生于“上海”的事件。《上海》这部小说通过人物群的各种行动得以展开。《上海》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上海”这个城市，通过具体性的建筑物的位置关系和细微的事物描写来架构而成，另外，把“事件”按时间顺序再构成。

第三章，“上海”和“事件”的重组。“上海”内部的位置关系，围绕“事件”的日历，在“上海”发生的“事件”四个方面依次进行研究。本文设想一个串联“上海”，“事件”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来重新组合一个《上海》的全体像，而这个形象不依赖特定的地名和日期。文章接着按出场次序列举了《上海》中描写的主要场所。把这些点要素作为串连的线，串连上登场人物的移动路线，“上海”的形象便会清晰起来。紧接着论文用了和第二章同样的方法，归纳了《上海》中记述的事件。如果追踪建筑物的位置关系和在这之间移动的登场人物的行动，以详细描写的细微事物等作为线索联系起来的话，就可以在读者面前展现“上海”的形象，同样，追踪每个“事件”并以一天为单位来归纳，可以发现《上海》的全部四十五章，就是二十个“某月某日”的“事件”。《上海》中写的中心“事件”，是以五三〇事件为模型描写的。

第四章，《上海》的小说内世界和地理性知识。本章笔者试将其与小说《上海》的记述之外的地理，历史信息加以比较，以探讨横光在构筑《上海》的作品世界时是如何进行筹措的。通过把上海的地理信息和小说《上海》的记述进行了对照。得出了以下两个新的结论：其一，“山口家”的位置并不在闸北北站的停车场附近；其二，“参木家”和“阿杉家”并不一定位于虹口的日本人街。

总之，横光利一在小说《上海》中描写的上海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可以以贯穿于一系列细微事物的连续性为基础重新构筑的。而在重新进行构筑时，是基于读者生

活实感中的空间或时间感受而作此构筑的。

“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 ——“真的知识阶级”与“底层”民众（摘要）

罗 岗

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如何？“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国内外诸多学人对这些问题或从理论或实践的角度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福柯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行为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是“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无法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另一方面，他指出 68 年以来知识分子本身构成了阻碍、禁止和取消群众言论和知识的权力制度的一部分，不再是为了道出大众“沉默的真理”而“向前站或靠边站”了；而更多的是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知识分子和民众作为反抗权力的同盟军，按照各自的方式在“同所有那些到处在维持同一权力的控制和约束作斗争”。这样“代表”和“被代表”的关系就被巧妙地消解了。

对福柯“代表”问题的消解论，女性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提出了质疑。她指出知识分子通过与权力的斗争巧妙地缝合了“再现”的间隙，民众依然必须借助知识分子开拓的管道才得以发声，形成“共谋”。其后果 v 一方面是“西方的知识生产成为西方跨国经济利益的共犯”；另一方面，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把更多同时也是更沉默无声的一群排斥在外，形成了现代“知识暴力”。斯皮瓦克特别强调了印度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贱民研究”对女性声音的忽视。但斯皮瓦克并没有取消被压迫者抵抗的可能性，突现了被压迫者灵活游移的权宜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

从福柯到斯皮瓦克，他们对知识、权力、知识分子和被压迫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十分精巧繁复。可是，即使如斯皮瓦克的论述，也难以避免被再次吸纳、收编进学院和知识体制之中的命运。况且他们讨论问题的路径一直局限在知识生产的领域里，忽略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路向：作为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以“左倾”、“革命”或“激进民主”的方式来建立与被压迫者不同诉求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是否可能催生出新的被压迫者的知识形式和言说方式？

鲁迅作为中国革命中“真的知识阶级”的代表，以文学的形式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底层民众”的言说诉求结合起来，在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的语境中，树立起了真的知识阶级的形象。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重新叙述了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则寓言，重构了“鲁迅文学”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

间的关系。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鲁迅的“弃医从文”，在《藤也先生》中鲁迅透过“幻灯片事件”建构了一个多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一个被日本人杀头的中国人与一群围观的中国人；鲁迅本人与这个图片；鲁迅周围的日本同学与这幅图片；鲁迅“看”他的日本同学是如何来“看”这张图片的；日本同学也在看“鲁迅”是如何“看”这张图片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鲁迅不仅是一个“观看者”，同时也是一个“被看者”。一方面鲁迅作为一个观看者，瞩目于图片上中国人的麻木，他扮演了一个先知先觉的启蒙者；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观看者，同时也是一个被看者，在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的眼光的压迫下，他（鲁迅）或他（被杀头的中国人）必然产生某种特殊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决不是用“启蒙主义”就可以完全概括的。

刚才的被救、“幻灯片事件”的“震惊”以及《祝福》、《故乡》和《在酒楼上》等小说中的“我”与描写对象，都在不同的情景中反复考量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小说中被描写的对象追求的是被给予的“解放”，并依靠拒绝承认自己的奴才地位而获得幻觉上的解放，而鲁迅则拒绝被给予的“解放”，正视面对的绝境，从而对绝望产生绝望，并在这种极限状态的挣扎中发生抵抗。

正是这种“拒绝”和“抵抗”的姿态使得鲁迅告别了现代体制之中的“知识分子”，而呼喊一种“真的知识阶级”，构想一种“真的知识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的新型关系，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努力实践着他的这一构想。

本期责任编辑：童中平 李强华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田家炳教育书院 428

邮编：200062

电话/传真：62232933

印数：500 份

E-mail:ecnu_urban@hotmail.com
